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近代中国与世界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JINDAIZHONGGUO YU SHIJI

(第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 近代中国与世界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JINDAIZHONGGUO YU SHIJIE

(第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一、二、三卷）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编 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责 任 部 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项 目 经理 / 杨 群

责 任 编 辑 / 颁杨陈梁史张等

责 任 校 对 / 苏 民

责 任 印 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 者 服 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65.25

字 数 / 1724 千字

版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7-80190-460-5 / K·114

定 价 / 148.00 元 (共三卷)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 权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目 录

中国和日本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 比较研究	严立贤 / 1
李鸿章与奕䜣等总理衙门大臣对日本认识的 比较	
晚清人士对外交与内政关系的认识	王如绘 / 23
——以薛福成为中心	刘悦斌 / 48
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	郭世佑 / 62
张謇与江苏谘议局	耿云志 / 92
袁世凯帝制论再考	
——古德诺与杨度	[日] 山田辰雄 / 109
近代化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近代中国人物	
研究	林家有 陈金龙 / 131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日本顾问	[日] 李廷江 / 149
中国革命与外国势力：孙中山的对外宣传	
从《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发现的 新史实	[日] 深町英夫 / 172
新史实	[日] 久保田文次 / 186

国民政府北迁后蒋中正驱逐鲍罗廷之议	王正华 / 202
蒋介石眼中的俄国顾问	陈三井 / 219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	
——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杨奎松 / 235
蒋介石外交战略中的对日政策	
——作为其归结点的“以德报怨”讲话	[日] 家近亮子 / 273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杨天石 / 287
1940年代中国“亲美派”的三元悖论	
——宋子文的美国情结与中国政治	[日] 西村成雄 / 309
蔡锷与国际公法	曾业英 / 332
李烈钧与日本	徐辉琪 / 349
邓演达在国际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1923~1928年)	[美] 贺钦贤 / 365
戴笠的通讯系统	[美] 魏斐德 / 382
辜鸿铭对列强和西方世界的抗辩	
——以“庚子之乱”为中心	李玉刚 / 397
章士钊的中西文化观	邹小站 / 427
移植与转化：晚清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	左玉河 / 446
刘大年与《评近代经学》	姜 涛 / 472
服饰变迁	
——非文本的社会思想史	刘志琴 / 498
战后上海美国电影市场研究	汪朝光 / 515
中国的近代化与孔教运动	
——孔教运动再思	[日] 森纪子 / 535

- 近代中国与基督教（1840~1911）：初探外国  
传教团追求建立中国自治、自养、自传的  
本土教会 ..... [美] 任 达 / 547
- 建国以来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 黎仁凯 / 572
- 关于中国近代民间宗教与拳会研究的争论  
焦点与动向 ..... [韩] 李银子 / 591
- Exploring China in the World in the Late-Qing:  
From Mohammed Ali to the Young Turks  
..... *Rebecca E. Karl* / 604
-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publican China and Italy, 1912~1945  
..... *Guido Samarani* / 636
- Место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 *Священник Петр Иванов* / 664

# 中国和日本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比较研究

严立贤

中国和日本同属非西方的后发工业化国家，同样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下，开始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并由此开始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过程的。但是，中日两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日本在 20 世纪 10 年代以前就初步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则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不仅没有初步培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清政府反而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中日两国在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本文试图对中日两国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时期两个经济因素的考察，分析中日两国早期工业化出现反差的根本经济原因，以为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

任何一个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封建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与此相应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但是，像日本这样封建的商品流通机构如此发达和完备的现象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里所谓封建

的商品流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赋税和地租为基础的商品交换，二是以农民的必要生活产品为基础的交换。

日本是一个幕藩制的封建国家，各藩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是与幕府相独立的，各藩均具有能够自给自足的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藩领域内不能自给的原料和产品，原则上一律通过城下町、通过城下町内为作为领主的大名所特许的批发商统一从领外输入，领内土特产品的输出也由城下町的批发商统一进行。农民作为调剂余缺的使用价值交换（也即以必要生活价值的交换）也必须在城下町或作为城下町的派出城市的在町中为领主所控制的市场内进行。这样，大名就在藩领域内确立了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这种以藩为单位的相对独立的市场体系叫做“藩领域市场”。大约在宽文元禄时代也即 17 世纪初前后，各藩都确立了藩领域市场<sup>①</sup>。

但是，藩领域市场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市场体系，它还严重依赖于中央市场。这是因为：第一，大名虽然相当于西欧领主封建制中的领主，他们所得到的贡租虽然也是实物地租，但不像西欧那样各种生活用品按比率征收，而是以米为主，所以他们必须把米投入流通领域，以换取货币和其他生活用品，而商品米的最大消费地不是藩内市场，而是京都、大阪及作为幕府的城下町的江户等几个中央城市。第二，虽然在各藩的城下町中，存在着由大名所特许的手工业者，但其数量不多，所生产的布料及其他手工业制品远不能满足大名和武士阶级的需要，更多的手工业制品要从中央市场上获得。如京都的西阵是当时的大名、武士和富商所消费的丝绸材料的主要生产地。第三，幕府对于大名的权力尤其是经济上的权力，要比西欧的国王对于领主的权力大得多。如幕府具有垄断性的货币发行权和金银矿的开采权；对大阪、京都和江户等具有中央市场功能的中央城市的直辖权；要求大名每隔一年携其家属到江户去住一年以防

<sup>①</sup> 丰田武等编《流通史 I》，山川出版社，1970，第 127 页。

止他们谋反，也即参勤交代的权力，大名在住到江户的时候，需要从市场上换取大量的货币。这些因素都促使各藩国严重地依赖中央市场。上述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全日本从农村到藩领域市场再到中央市场，形成了一个触角伸至农村各个角落的、非常发达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体系，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都被严格编织在这一体系之中。而承担这个商品流通体系的商品流通功能的，则是所谓的批发商（問屋）体系。在当时的中央城市，集中着大量批发商组织，它们或按行业或按区域组成各种批发商行会。如大阪在正德年间已有各式批发商 81 种 16763 家<sup>①</sup>，京都有各种行业批发商 397 家，另有外贸批发商 120 家<sup>②</sup>，江户的批发商被按照经营品种分成 10 组，称作“十组批发商”<sup>③</sup>。

具有发达而完备的封建商品流通机构是日本的独特特征。在中世纪的西欧，在封建城市中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批发商体系的商业行会，但是，其势力仅限于城市内部，最多能伸展到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带，离城市较远的广阔农村地带只受居住在农村庄园里的封建领主统治，而不受封建城市的统治。到中世纪末期，经过一场“封建危机”以后，随着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庄园逐渐趋于解体，农民逐渐从封建领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独立的独立自营农民——约曼农。封建庄园解体的地方，都是不受封建统治的自由地方，也是城市行会所不能触及的地方。随着封建庄园不断瓦解，封建统治者的地盘越来越小。王权曾千方百计地试图使城市的行会制度伸展到农村，但都失败了。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地主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与日本相似，也是农村受城市的统治，但其统治方法不同于日本。日本幕藩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武士阶级，但武士只在政治上进行统治，经济上的统治则由批发商代为进行。中国

① 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日本产业史大系》（近畿地方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第 113 页。

② 中井信彦：《近世都市的发展》，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第 11 卷。

③ 丰田武等编《流通史 I》，第 170 页。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的阶级基础是官僚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都由地主阶级进行，城市批发商的势力虽然也伸入农村，但并没有伸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体系。

日本在封建商品流通体制上的特点必然要影响到它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具体形式。

—

这种发达而完备的商品流通体制也即全国统一的批发商体系，对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产生什么作用了呢？我们考察的结论是，它使日本在幕末时期形成了包买商制家内工业生产形式，对日本的早期工业化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在幕末时期以前，批发商一直是批发商，他们只是在流通领域活动，单纯地担负商品流通的职能，虽然也存在着通过向生产者预借资金和生产资料的情况，但这只是一种非常偶然的现象。批发商还是批发商。到幕末时期后，批发商通过对生产者进行资金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前贷予，达到控制生产过程的情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批发商不再是单纯停留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资本，而是逐渐渗透到生产过程中去。批发商不再是单纯的批发商，而成了一种包买商<sup>①</sup>。我们把包买商控制生产过程的生产形式称作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

---

① 批发商为什么会成为包买商呢？恩格斯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恩格斯说道：“是什么原因推动商人（也即我们所说的批发商——笔者注）去承担包买商的额外业务的呢？惟一的原因是：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商业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的经常就业，这样，他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5页）

日本自 18 世纪中期开始出现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sup>①</sup>，从而开始了原初工业化过程<sup>②</sup>。日本丝织工业的原初工业化区有两个：关东的桐生和近畿的丹后。它们出产的产品一方面供应农村市场，另一方面不断地侵蚀着西阵的销售市场，使西阵的行会丝织业陷于不断衰退的境地。到天保（1830～1843）年代，桐生出现了不少拥有 5 台左右织机、雇佣 10 名左右工人的集中作坊，丹后也出现个别拥有 3 台织机、雇佣 4～5 名工人小作坊<sup>③</sup>。棉纺织工业的原初工业化区主要集中在近畿的摄河泉地区、中部的尾浓地区和关东的八王子一带。其中最发达的是尾浓地区，中心则是鹈多须代管所管辖的 42 个棉纺织村。天保十五（1844）年，这 42 个村共有从事棉纺织生产的农户 322 家，织机 1435 台，平均每户 4.5 台，若除去其中的租放机（即出租给别人使用）471 台，则平均每户有内机 3 台<sup>④</sup>。其中生产规模达到手工工场水平的有 4 家，他们分别是小信中岛村的孙次郎家（经营内机 9 台）、下祖父江村

- 
- ① 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是一个与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相对应的概念。以农民的必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系指那种农业收入严重不足，把手工业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的农村工业。由于此时农民收入没有出现剩余，缺乏广大农民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非常狭小。而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则是在农民的收入水平出现超出维持生计以上的剩余的情况下，由农民的消费需求所带动的农村工业。由于有农民的消费需求的带动，农村工业所需的国内市场大幅增长，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农村工业的生产者可以从手工业生产中获得超出维持生计以上的剩余。随着农民手中的剩余和农民对工业制品的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农村工业的生产规模也会随之不断地扩大，并沿着小手工业→小资本家经营→手工工场的方向发展。
  - ② 农村工业有各种类型。一种是为农家自己的消费而进行的生产，自己消费有余才用于出卖，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下的农村工业。另一种是为出售而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出卖，而不是自给有余才出卖。由于这种农村工业已经脱离了自给自足性质，因而具有脱离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化的倾向，我们把它叫做原初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
  - ③ 具体的材料及相关考察请参阅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 123～145 页。
  - ④ 参见中村哲《日本初期资本主义史论》，ミネルヴア书房，1991，第 106 页。

的纹藏家（经营内机 18 台，租放机 1 台）、下祖父江村的重左卫门家（经营内机 13 台，租放机 12 台）和山崎村的胜右卫门家（经营内机 10 台，租放机 7 台）<sup>①</sup>。在原初工业化的各个行业中，以棉纺织业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棉纺织业的消费对象是广大农民，棉纺织业中的原初工业化越是发展，意味着农民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农民的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经济越来越具有近代经济的性质。世界各国的近代工业化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

但是，日本的原初工业化并没有像西欧那样，沿着小手工业→小资本家经营→手工工场→机器大工业的方向发展，而是于文政天保年间（19世纪20~30年代）发展到出现为数不多的像样的手工工场之后开始衰退，到幕末时期，大部分原先独立的小手工业和集中作坊都退化为从批发商那里租借生产工具和原料，为批发商工作的家内工业，原先的批发商变成了包买商。如桐生丝织业，到幕末的时候，“已经几乎没有雇有一二个或二三个雇工的小手工业者了”<sup>②</sup>。在丹后丝织业中，自营机也不断地转化为挂机（即自营机主将织机租放给贫困农户）和步机（即原来的自营机主沦为隶属于包买商的农内生产者，他们接受包买商贷给的生产工具或原材料，但丧失了产品的所有权）。有的村甚至“村中只有步机”<sup>③</sup>。棉纺织业也一样。在摄河泉地区，和泉的棉纺农家成了隶属“棉买”（棉纱包买商）的原料加工者<sup>④</sup>，棉织农家“大多数都是从京都、大阪的包买商那里接受原材料进行加工，领取纯粹的工钱”<sup>⑤</sup>。河内一户包揽范围 20 公里 30 多个村子的棉纺织品买卖的大包买商山胁家，交易量中的绝大多数是“预借交换”（也即生产前贷给纺织农户资金或原材料，代之以控制其产品的所有权）<sup>⑥</sup>。在尾浓地区，到幕末时

<sup>①</sup> 盐哲君夫、川浦康次：《寄生地主制论》，御茶水书房，1979，第 161~162 页。

<sup>②</sup> 信夫清三郎：《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说》，日本评论社，1952，第 24~25 页。

<sup>③</sup> 地方史研究协议会编《日本产业史大系》（近畿地方篇），第 83 页。

<sup>④</sup> 相泽正彦：《泉南织布发达史》，大阪市参事会，1924，第 19~20 页。

<sup>⑤</sup> 《大阪府志》第 2 编，第 281 页。

<sup>⑥</sup> 参见中村哲《日本初期资本主义史论》，第 154、159 页的表格。

期，4个最发达的纺织村子中上祖父江村、下祖父江村和山崎村都衰退了，失去了中心的位置，只有小信中岛村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无论是发展的村子还是衰退的村子，生产规模和雇工数也都大大缩小，并且“出机”经营（也即由包买商或代理商将织机和原材料贷给贫困农户生产，收取产品付给工钱的经营方式）占主导地位<sup>①</sup>。也就是说，到幕末时期，生产者已经普遍受到批发商的渗透，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成了日本工业生产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

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的出现使得日本的农村工业不可能像西欧那样沿着小手工业→小资本家经营→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道路发展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但对其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发展并不是没有意义。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形式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工业化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包买商制的生产形式，千千万万个分散的小生产的利润被集中到包买商手中，从而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维新政府的主导下，开始由包买商制工业生产向近代大工业生产过渡。其特点是不再设立手工工场，而直接向机器大工业投资。日本向近代大工业生产过渡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各经济阶段的非连续性，即包买商制工业生产阶段与手工工场阶段是非连续的，手工工场阶段与近代大工业生产阶段也是非连续的，后一阶段不是前一阶段高度发展的结果。近代大工业生产不是由手工工场阶段发展而来，而是大包买商资本在维新政府的扶植下，直接向近代大工业转化的结果。以棉纺织业为例，明治15（1882）年前后设立的15家2000锭以上规模的棉纺厂，除广岛纺绩所和爱知纺绩所两家系由政府直接创办的官营示范工厂，以及4家由大地主创办者外，其余都是由各式包买商创办的，他们当中有棉包买商、吴服包买商、果子包买商、米包买商、盐包买商和糖棉进口商<sup>②</sup>。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企业勃兴”的主要担当者就是大大

<sup>①</sup> 具体的考察请参阅拙著《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第183～193页。

<sup>②</sup> 相泽正彦：《泉南织布发达史》，第19～20页。

小小的包买商、金融业者和地主（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以及三井、三菱、住友、藤田和涩泽等政商和财阀（主要集中在铁道和大规模建设业），他们都是民间资本。另外一些中小资本（幕末时期附属于包买商的小代理商及一些还没有在包买商的侵蚀下退化萎缩的小手工业等）则向手工工场过渡，但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微不足道。也就是说，明治以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是以民间资本为基础的。维新政府原来试图通过官营企业的形式推行完全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但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就将官营企业下放给了民间资本（主要是大包买商资本），采取了扶植民间的包买商资本直接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方针，包买商资本是明治维新以后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主体。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最初以建立官营半官营企业为目的，类似于中国的洋务运动。但是，日本在以下两个方面不同于中国：第一，在官营企业亏损以后，明治政府就认识到官办道路走不通，开始采取扶植民间资本的方针；第二，在明治政府做出将官营企业下放并扶植民间资本的决策之后，民间有大量的资本去购买濒临破产的官营企业，有大量的资本去投资近代工业。这里所说的民间资本主要就是包买商资本。包买商资本虽然是一种前近代的资本形态，但却不是官营资本，而是一种民间资本形态。明治维新以后，包买商资本的特权被废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迫向近代的产业资本转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工业的初步形成，是自上而下道路和自下而上道路相结合的产物。

### 三

对日本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产生有利影响的，还有一个因素，即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的出现。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对于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从传统商品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产生近代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过渡。

商品经济有两种形态，一是传统商品经济，一是市场经济。传统商品经济也是一种交换经济，但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属于商品经济的低级形态，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中存在。传统商品经济中的交换可以有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与某一居住地的居民密切相连的集市贸易，诸如墟市、集市、定期市等等。二是地方市场，即某一地区以某一个城镇为中心形成的诸个集之间的商品流通体系。三是区域市场。地方市场并不能完全满足消费的需要，许多消费品还必须从更远的地方输入，导致一些产品在更大的范围内流通，从而形成区域市场。区域市场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共性相结合的产物。施坚雅把 19 世纪的中国分为西北、云贵、岭南、长江中游、长江上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和华北 8 个区域体系，这 8 个区域体系实际上就是区域市场<sup>①</sup>。四是全国交换圈。区域之间因自然条件的差异引起产品结构不同，要求某一种或几种产品在比区域更大的范围，也即全国进行交换。最后，个别产品还有可能在国家之间进行交换。在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社会形态中，也存在着国际贸易，但这种国际间的贸易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属于商品经济的内容之一。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高级形态。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不仅仅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且是增值价值的交换。交换不是为了换回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增值了的价值，是为了获得利润。传统商品经济的交换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其交换的动力在供给方，是生产决定销售。农民是否出售以及出售什么，并不是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产品的余缺情况所决定的。而市场经济中，交换是为了实现增值价值，为了获得利润，其交换的动力在需求方，生产什么，出售什么，都是由需求决定的。需求决定生产，从整个社会来看，就是市场引导生产，市场成为全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需求的增长，市场的扩大，必

<sup>①</sup> 施坚雅等：《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 168 页以下。

然带动农村工业由家庭生产向集中作坊、向工场手工业发展，并最终发展为近代机器工业。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工业由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的过程，就是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

那么，由传统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动力和条件是什么呢？是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即农民手中出现超出维持其基本生活以上的剩余。农民手中出现超出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剩余，就会用它来增加自己的消费。首先增加的，当然是粮食的消费，能吃饱肚子。但粮食的消费是有限度的，因为粮食消费的弹性很低。其次是增加衣服的消费。衣服消费的弹性很高，从一套衣服到几套衣服，从质地很差的衣服到质地很好的衣服，消费量可以成倍成倍地增长。农民手中出现剩余，意味着整个社会对棉纺织品的消费需求将大大地提高，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国内市场将大大地扩大。随着农民的剩余的不断增长，对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必将不断扩大，从而必将带动农村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向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发展。所以，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总是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为主导部门。由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过渡的这一过程，曾在西欧有过经典表现。日本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sup>①</sup>，由此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出现了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农村工业化，在最发达的文政天保（1818~1843）时期，曾在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中都出现较多的集中作坊和几个手工工场。虽然，由于日本不能像西欧那样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增长，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不能不断地增加，农村的原

<sup>①</sup> 日本从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价值，主要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日本的粮食产量在18世纪中期以后有了大幅度增长，增长幅度达到14%以上，到19世纪初则增长了24%以上。参见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经济社会的成立》，第44页，岩波书店，1988。由于贡租率没有增长，增长了的粮食都留在了农民手中，从而使农民手中出现了剩余。

初工业化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sup>①</sup>，加上包买商的剥削，最后形成了包买商制工业市场形式，但是，农民手中出现剩余产品价值，一方面扩大了农民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了为近代工业化所需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也为包买商的吸吮，为包买商的资本增值，为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从而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近代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条件。

## 四

中国的情况则大大不同于日本。首先，中国虽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但却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没有成熟和完善的流通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结构的特征是：①地方市场比较发达。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社区的主要形态不是村庄，而是以墟市（集）为中心的地方集市区。“也许因为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其职能太弱，加之县衙鞭长莫及，中国的地方集市区起而填补了地方管理功能的空白，具备了社区的各种特征。明确的界线划定每个集市区平均有 15~30 个村庄，这些村庄不仅定期赶集做买卖，而且聚在一起进行娱乐、接谈婚嫁并交换外界信息，使集市成了地方活动的公共场所。在这种 2000~3000 户的集市区中，商业和服务的流通相当大，但与其他区域的交往则比较有限”<sup>②</sup>。②城市中的居民主要是城居地主、官僚以及一些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批

① 从完全的传统经济到原初工业化开始，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样，从原初工业化开始到进入工场手工业，也需要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大幅度增长。英国从完全的传统经济到原初工业化发生，农业劳动生产率仅谷物产量一项，就提高了 27%。由此再到原初工业化进入工场手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又进一步增长了 48%，从工场手工业到工业革命时期，粮食产量又增长了 51%。参见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40 页，三联书店，1992。日本从原初工业化发生的 18 世纪中期到明治维新前后，大米亩产量只增长了 26.8%，人均拥米量只增长了 29.3%。见速水融、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 I——经济社会的成立》，第 44 页。

②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第 206 页。